

镜内镜外

唐晓渡 著

卞之琳

牛汉

邵燕祥

忆明珠

郑玲

昌耀

食指

镜

内

内

北岛

芒克

杨炼

多多

江河

顾城

西川

欧阳江河

于坚

王小妮

海子

翟永明

臧棣

麦城

陈超

吉狄马加

外

作家出版社

镜内镜外

唐晓渡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镜内镜外/唐晓渡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63-7809-3

I. ①镜… II. ①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5783 号

镜内镜外

作 者: 唐晓渡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405 千

印 张: 15.625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09-3

定 价: 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1954年1月生。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当代国际诗坛》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工作，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著有诗论、诗歌随笔集《唐晓渡诗学论集》、《今天是每一天》等七种；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以及S.普拉斯、V.哈维尔、C.米沃什、Z.赫伯特、M.赫鲁伯等诗人、作家的部分作品；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帕米尔当代诗歌典藏”多卷本等；另编选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当代先锋诗三十年——谱系和典藏》等十数种诗选。参与创办民间诗刊《幸存者》《现代汉诗》。评论和诗歌作品被收入国内外多种选（译）本。2012年获首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2013年获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



目 录

最后的绝望和最后的救赎	
——重读邵燕祥长诗《最后的独白》	1
另一个世界的秘密飞行	
——牛汉和他的《梦游》	17
“终于被大海摸到了内部”	
——从大海意象看杨炼漂泊中的写作	29
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	65
谁是翟永明？	91
顾城之死	111
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	
——读食指近作	127
风暴蝴蝶或月光下的孤村	135
孔孚山水诗中的旨趣悖谬	147
寻找一个失踪的诗人	163
当海洋打开了所有的道路	176
身份认知和吉狄马加的诗	199
把风暴引进更高的城邦	225
静水深流或隐逸的诗学	
——读子川诗集《虚拟的往事》	237
激情的渊薮及其解剖学	252

北岛：看大地多么辽阔	258
芒克：今天是每一天	267
多多：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	273
杨炼：在水面上写字的人只能化身为水	278
江河、顾城：花朵和野兽都已沉睡	286
陈超：乌托邦最后的守护者	294
麦城：先行到失败中去	299
臧棣：另一种印象	307
流浪汉戴迈河	312
行者昌耀	321
世纪行过，卞先生走好	327
作为钟、铸钟人和钟声的牛汉	330
永远的希尼：归功于诗	337
单恋：有关帕斯的若干瞬间	342
人与事：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	360
湾园一万松浦：水与水的相遇	395
疯狂的梦想和现实之间	
——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乱弹	404
诗歌和风水	418
一个故事，几点看法	420
快乐的恐龙	424
镜内镜外	430
“一瞬光中我暂住”	
——忆明珠评传缩略	439

最后的绝望和最后的救赎

——重读邵燕祥长诗《最后的独白》

一、悖谬

1988年在《中国诗人》创刊号上读到《最后的独白》，当即珍藏。1993年与谢冕先生联合主编“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六卷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由我编选的“长诗·组诗卷”《与死亡对称》中收入了此诗，并于序言中有所论及：

郑敏对死亡的把握在生死之间进行，邵燕祥的《最后的独白》则在死亡和拯救之间进行。诗中的主人公、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的命运整个儿是一个巨大的悖谬和嘲讽：那最初拯救她的人，就是最后促成她走向死亡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其间发生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所谓“最后的独白”是否包含了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如果不是，主人公为什么会毅然选择死亡？如果是，那么使之变得无可避免的界限又在哪里？是什么力量使主人公产生了不可遏止的自我毁灭冲动？那迫使她产生这种冲动的毁灭性力量又是什么？……尽管诗人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探索，但这首诗还是留下了足够多的谜团和纠结。它们显然不仅仅关

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和情感，还关系到她（他）的信念。由于造成了主人公命运悖谬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睿智的”革命者和历史性的“大人物”，所以她的死亡远远超出了个人悲剧的范畴，而那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婚姻之索也因此成为权力的象征或隐喻。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异邦故事，但它真是一个异邦故事吗？把这首长诗称为“剧诗片断”在我看来同样是意味深长的：既是“片断”，就另有上下文，包括本文中的断裂和空白。就这样，一个人行将赴死，却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联想和思索空间。

二十余年后再读这首长诗，我发现首先抓住我的仍然是主人公命运的悖谬：那最初拯救她的人，就是最后促成她走向死亡的人。这固然表明多年来我的少有长进，却也表明了悖谬本身的持恒引力。

悖谬即心结，既无从摆脱又必须摆脱的心结；而这样的心结，往往正是诗意的渊藪。这里的诗意当然涵括了戏剧性，并且是最残酷、最深刻的戏剧性。

就本诗而言，主人公命运的悖谬不仅在语义层面上象征性地指向了历史的悖谬，而且作为全诗的结构枢机和张力所在，凸显着文本自身所体现的诗和历史的悖谬。

三重悖谬三重渊藪——只有那些心怀如此渊藪的人，才能真正听懂主人公“最后的独白”，才能深切感受那既来自“一个不期望历史理解的/三十一岁的俄罗斯女人的魂灵”，又来自一双寻找她的中国诗人的眼睛，二者混而不分，或彼此共鸣的空谷足音，其沉痛郁结一如其锐利淋漓，都直击人心，而又因人心的空旷格外回旋不已。相对于凝神倾听这样一支心曲，诸如这部当代诗歌付出惨重代价才收获的杰作在其谱系中的地位如何，为什么长期以来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类的问题，尽管并非无足轻重，但终于只是些第二义的问题。

二、从“本事”到情境

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于1932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之夜。她的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至今仍然是谜，并将继续如此。换句话说，无论人们怎样探究，都不会有所谓“真相大白”的一天。

从真实发生过的“本事”到追述的“谜团”之间，有时只隔着一张纸或一根舌头的距离。一桩荒野中的普通血案，在当事人和目击者都未缺席的情况下，尚会导致“罗生门”式的叙述歧异，指望那在戒备重重的“第一家庭”私邸里发生，并立刻令所有闻知者讳莫如深的“最高机密”，居然会有什么真相大白的一刻，难道不更是一种虚妄吗？

除了枪声，只有“急性阑尾炎手术失败”的谎言是确凿的，其余的说法都带有明显的失语征候，更像是从强迫性沉默中生出的种种想象、蠡测和巧舌。“最高领袖”作古，独裁者的禁忌消弭，有关的陈说却变得愈加云山雾罩。历史叙述的脆弱性在这里可以被概括为德谟克利特的一个著名悖论，在他看来，所谓真相（本事），就是“那个无底洞的底”。

然而无底洞又如何？正是在脆弱的历史叙述陷入混乱之际，诗人挺身而出。诗在历史却步的地方起步。

这当然不是说诗人更有能耐，可以侦破、还原那不可企及的真相——不，此一意义上的“真相”从来就不是诗的属意所在。诗人不侦破，只勘探；不还原，只揭示。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他所致力勘探和揭示的，是另一种真相：心灵和情感的真相。

正是立足这一角度，诗人在题记中认可阿利卢耶娃死于自杀的说法，进而抓住相关本事留下的一条最重要的“踪迹”（或悬念——据称死者当晚曾有遗书，但被斯大林看后即刻毁掉），不仅从中生发出本诗的特定文体（剧诗片断），而且据此规约了本诗的特定情境（临

终书信)。在这样的情境中，对逝者自杀动机的探询追索被转化成主人公的自我探询追索，作为缘起的本事踪迹循着回溯的因果链，激荡并集合起更多的本事踪迹。它们既是材质又是元素，既彼此构造又彼此照亮，在互为前景和背景中结成一张巨大的心理冲突之网。在这样的情境中，本事层面上墓木已拱的主人公重新复活并开口说话，而她自我揭示的心路历程表明：是谁的手指最终扣动了那把枪的扳机，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她的死首先是一个精神事件，其必然性超越了任何刑侦学的分类。相对于肉身的即将殒灭，其精神的死亡早已先行发生；它并非一个砰然的瞬间，而是一个隐秘的过程：

她还没有死，但是一脚踏进坟墓的门槛。

她已经死了，

死于最后的绝望。

然而，无论是精神还是肉身的死，都没有理由成为无声无息的死，一种白白的死。这里，与“最后的绝望”对称的，恰恰是“最后的独白”。独白即心声；最后的独白：彻底敞开的心声。就其彻底性而言，它不仅直接通向诗，而且可以被视为一份超级证词：正像它并没有指证任何凶手，却把施害者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样，它在诉说主人公为什么会选择死的同时，也证明了她的精神不死以至不会死！

尘封的历史帷幕倏然开启，哀伤而激愤的主人公独坐聚光灯下。这到底是谁的身影？是曾真实存在于某一时空的阿利卢耶娃，还是化身为阿利卢耶娃的诗人？没有人会强作区分，因为这情境，这“最后的独白”，本来就是两颗心灵、更多心灵的彼此映证。时空和身份的分隔于此毫无意义，在诗中复活的阿利卢耶娃已属于我们——让我们还是叫她的爱称“娜佳”吧。

三、拒绝虚无：我是谁

“只要人们没有发现生命的游戏是愚蠢的，他就会期待它；人们一旦能够认识它的愚蠢，就会自杀，这是我将要做的。”老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之一）如是说。

然而这桩被事先张扬的自杀案却始终没有发生。这当然不是因为安德烈介身其间的生命游戏不够愚蠢，或他面对这样的愚蠢不够聪明，或他本来就是个轻佻无信之人，而是因为生命主体本能地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优先的考虑；是因为这种优先考虑的首要意义是有所期待而不是游戏，故它总能超出一切游戏，包括对它的认知；是因为他所谓的游戏无论多么愚蠢，都没有完全封闭来自他生命自身的期待，令他退无可退，陷入“最后的绝望”，换句话说，安德烈绝望得还远远不够，充其量只是抵达了通常所谓的“虚无”。他决定终老领地尽管表明了内心虚无感的深化，却也表明，他和他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之间尚大有妥协的余地；而从虚无的方向看，他最终的死于卫国战火，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理想的归宿了。

从安德烈到娜佳的距离，就是从“虚无”到“最后的绝望”的距离。最后的绝望：生命的黑洞。它是对生命主体，对其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包括人格尊严，甚至也包括虚无的绝对否定。

据此可以引申出“最后的独白”的对称定义，即最后的救赎。所有被“最后的绝望”吞噬的，在这里都将重见天日，成为生命能量守恒的一个极端例证。

毫不奇怪，对娜佳来说，“最后的救赎”是从质询“我是谁”开始的。这一质询两度出现在第一章有特定所指，且混合了幽怨、抗辩、讥刺以至申斥的上下文中表明，她对自我身份的辨认更多地不是基于危机突降时举目惘然的迷失，而是基于长期煎熬后有所定见的持

守，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结点。身为妻子却被丈夫“面对面”地忘怀，身为丈夫却早已听不见妻子“近在身边”的心跳，身为父亲却不吝对儿子滥施残酷到足以致命的羞辱，如此反伦常的情感冲突可以并不因为发生在“第一家庭”而显得特别不可思议，却无疑因此具有了格外的严重性：

然而，你总在燃烧的胸中
一颗心为什么骤然冰冷？

更可怕的问题在于：这颗心的“骤然冰冷”意味着什么？这一在追忆中被尖锐指陈的突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又将导致什么？如果说这种突变早已令所有和初衷有关的记忆，包括“你”曾经的大地情怀、拯救行为和精细入微的睿智变质，以致走向反面，成为不为人知的悍然背叛或自我背叛的话，那么，这种变质，这种背叛或自我背叛所牵动的，会仅仅是个人恩怨的情感层面，仅仅事关“第一家庭”的崩盘与否吗？

由此主人公的命运悖谬同时指向历史的悖谬，对“你”的质询同时成为对变幻的时代风云的质询，而主人公的自我身份辨认也跳出了“你”的巨大阴影的笼罩，成为死志已决的娜佳对真正的娜佳的辨认。当否定的手指掠过“那个溺水的女孩”，掠过“那个可笑的穿制服的女学生”，逐一叩响“妻子？主妇？朋友？伴侣？抑或只是你麾下的千百万士兵和听众里的一个”时，我们和娜佳一样知道，所有这些曾经是，或可以是她身份标志的，尽管都对应着她某一层面、某一局部的生活经验，却从来不是真正的娜佳，即便加起来也不是——非但不是，还构成了对后者的幽禁和遮蔽。真正的娜佳活在所有华丽的表象之下，活在她一天天被命运的悖谬撕裂，被“最后的绝望”吞噬的心里，更准确地说，活在她当下即刻“最后的独白”之中。在这样一个

方死方生的救赎区间，两个娜佳将合而为一，枪声中将升起她饱受摧残而又不屈不挠的灵魂——真正的娜佳，就是她那虽然在痛苦、孤独、幻灭中业已破碎不堪，但仍不失高傲，仍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做出最后抉择的自由的灵魂。

是的，自由的灵魂——这是娜佳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身份。正是这一身份使“我是谁”的质询同时也是回答，使“最后的救赎”同时也是，并且只能是自我救赎。据此娜佳通过选择死亡而拒绝了死亡，与此同时也拒绝了虚无。

四、命运·反刺

在娜佳最初和最后的身份之间并没有横着一道万里长城，只隔着斯大林，隔着她与斯大林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斯大林就是她的长城，就是她的命运。

是斯大林，在她三岁不慎溺水时出手相救；是斯大林，让她在十七岁那年成了一个革命者的妻子；仍然是斯大林，使她年不及二十五，就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第一夫人”。

令多少人眼热和膜拜的“第一夫人”！有谁会将其与“土耳其后宫的女奴”，与“挂在别人的脖子上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确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就像这场婚姻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位一样。是斯大林，仍然是斯大林，使之变成了比必然的逻辑更坚硬的现实——使长城变成了囚牢的院墙（这正是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情景），使曾经的倾心相爱者变成了“孤独的一对陌生人”，使婚姻本身成为娜佳不得不忍受的持续羞辱。

为什么会是这样？婚姻本该是一条维系共同命运的纽带，为什么它所实际维系的，却是一条命运的绝对的不等式？这是强权无限大的特权吗？

娜佳对此是否也负有责任？当然。因为作为这一不等式趋于无限小的一方，她居然对自己的处境心怀不满甚至心有不甘，换句话说，既不以“第一夫人”的神圣和荣耀为意，也不懂得恪守“第一夫人”的本分；因为她居然不知道“揣摩上意”，始终和最高领袖保持一致，更有甚者，居然认为自己比那些“聪明人”还聪明，祈求领袖正视人民深陷贫困、乌克兰正经历大饥荒的现实；因为她居然没有想到，在既“不容虚伪，但也不容真实”的领袖看来，诸如此类的直言不讳，无异是在代行只有苏维埃的敌人才会进行的攻讦和污蔑。

娜佳的最终责任：她居然不能因应命运的变化，居然不能容忍业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命运篡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色**。为此她必须付出代价——既然“性格就是命运”，那她就只能经受**不容命运篡改本性的性格**所必然经受的命运。

娜佳怎样看待自己的命运？

诗中有四处直接写到了娜佳对命运的意识，分别出现在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十章。尽管作为“最后的独白”，它们理应被视为不同的心理层面做共时的解读，但也不妨从发生学的角度，将其读作一个历时的过程。其中转折点出现在第四章：如果说“命运在敲我的门 / 还是我在敲命运的门”（第二章）还只是在忧伤中隐隐透出了不祥，而“丑小鸭本来会有别的命运 / 为什么一定要变成孤独的天鹅”（第三章）已经蓄积了足够多的幽怨和追悔，那么，从本章“最后的祈求”中排闼而出的激愤和无告就表明，她对命运的承受早就达到了心理的极限：

命运！

不是命运！

我不祈求命运！

茨冈女人还会怎么说？

我掌心里有长长的爱情线

和长长的事业线，
已经证明是命运的欺骗；
还有一条长长的生命线，
残存的痛苦的财富，
但我，为什么不能对命运
最后来一次无力的反叛？

与“最后的祈求”相对应的，是多年前曾经的祈求，二者之间隐藏着一个是魔鬼制造的秘密，由此娜佳和她的同学、朋友在同样无辜的情况下以不同方式跌入了各自的深渊；而娜佳经历的甚至更加残忍：相对于那些莫明消失在“沉默的烟圈后面”的同学和朋友，她的特殊角度足令她能很快察知这一秘密，却又无从公开，于是不得不让莫须有的“告密者”在心中发酵成一种真正的罪责，并不得不独自承担这一罪责。不难想象，如此卑鄙、龌龊和险恶的把戏出于那个睿智的大脑会给娜佳造成怎样的羞辱和毁损，因为这次受到羞辱和毁损的，已远不止是曾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爱情或早已病入膏肓的婚姻，而更多是人类起码的良知，是她从少女时代即已投身其中，且与他的名字密不可分的理想和事业，是她对他残留的最后一点信任。巨大的受骗感不仅导致了同样巨大的幻灭，也使她的命运突然变得透明：

生活在秘密太多的国度，
命运对我却不再是秘密。

换句话说，她已反身洞察了命运的秘密：这样的命运已不只是一要篡改她本色的性格，而是要完全剥夺和埋葬她的一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是从那一刻起，偶像彻底坍塌（尽管它早已开始坍塌），“最后的绝望”开始无可救药地深入她的骨髓；正是由此带来的彻骨寒

意，使她此后的内心生活越来越像第五章那亦真亦幻的梦境所揭示的冰雪世界；也正是从这铺天盖地的冰雪世界深处，最终升起第十章中她那坚定、冷峻、决绝的宣示：

如果是上帝决定我的命运，你就是上帝。
如果是魔鬼决定我的命运，你就是魔鬼。
无论你是上帝还是魔鬼，
我第一次不再听命运的决定。

随你怎么说——
家中的反对派。
第一个抗议者。

我走了。
我走我自己的路。
但是不，我就留在这儿了，
我不去高加索！

与之对称的是娜佳形象的变迁。这一形象在第二章中意味深长地与石油贵族祖巴洛夫的家属们的形象叠映在一起，在第三章中于反差巨大的种种追忆、虚拟和现实的角色（工学院的学生、涅瓦河畔的少女、伏拉季米尔大道上的革命者、灰堆旁的普通农妇、挂在别人脖子上的女人）之间流转不定，而到了第四章，却几乎已经变得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俄罗斯人毫无二致。陷身“已不再是秘密”的命运，她和他们一样孤苦无助，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一直如此的生活，而她面对的是被打碎后“难于重建的生活”；只在于她准备继续忍受这暴虐的命运：她将通过一次反

叛——即便是无力的——表达她对这种命运的蔑视。为此她将动用她同样是唯一的手段：她将掷出自己的生命。

那曾经抓住过安德烈的巨大虚无感此时也抓住了娜佳，就像曾经抓住过类似境遇中的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然而，由于这最后的一搏，她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前者，而是后者的行列。由此将铸定她最后的形象。这一形象将超度她前此所有的形象，包括第五章中被冰雪的大氅紧紧包裹的形象，第七章中“一条小木船拖在一艘巨轮后飘荡 / 一头小牝鹿拖在高驾的马车后狂奔”的形象，而与第九章中那只二十年代撞死在空旷后宅里的白羽鸟的形象融焊在一起，从而不仅成为她本质清纯的表征，更成为她捍卫生命尊严终极自主的表征。这一形象不是、也不可能是对“难于重建的生活”的任何意义上的代偿，恰恰相反，是对那迫使生活变得不可重建的命运禁锢的悲壮反刺，是表明被强权掌控的生活不值一活的惨烈指证。

五、忏悔和祈祷：复合的声音

在开头提到的那篇序文中我曾写道：“长诗是诗人不会轻易动用的体式。就通常的表现需要而言，短诗所具有的弹性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一旦诗人决定诉诸长诗，就立即表明了某种严重性。”

那么，邵燕祥创作这首近500行的长诗表明了什么样的严重性？

《最后的独白》发表于1988年，写作时间当更早。其时苏维埃帝国尚未来得及在全世界的注视下骤然解体，福山（F.Fudnyaman）还要等到更晚，才能宣布他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然而，对完整地亲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灾难岁月，只是由于侥幸才得以存活下来的邵燕祥来说，那个以庞大的乌托邦为始基和表象的时代早就崩溃了——无待任何外在的标志性事件，他首先在自己的命运中，在自己被一再摧残和扭曲的内心深处看到了这种崩溃。